·学术评论·

DOI:10.20004/j.cnki.ujn.2024.01.016

海外中国抒情传统理论的发展脉络

李　雪[1],高　斌[2]

(1.南开大学 文学院,天津 300071;2.南方科技大学 人文社科学院,广东 深圳 518055)

[摘　要]中国抒情传统理论是海外汉学关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一种主要研究方法。中国抒情传统理论体系开创者为著名华裔汉学家高友工,其完成了对中国古典文学抒情美典理论的建构。其学生将抒情传统理论分别应用于诗歌、小说、词学及戏曲等各体文学的研究之中。港、台和新加坡学者则对中国抒情传统理论完成了进一步的深化和拓展,而后中国抒情传统理念逐渐渗透于中国文学研究的各个领域,并成为海外研究中国文学的一种主要方法。

[关键词]中国抒情传统理论;高友工;海外汉学;古典文学研究方法

[中图分类号]I20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3842(2024)01-0161-07

中国抒情传统理论是海外汉学界研究中国古典文学最主要的研究方法之一。时至今日,中国抒情传统理论在理论建构和研究实践两方面,均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虽然这一理论范式在国内遭到了部分非议,但无可厚非的是中国抒情传统理论仍是海外研究中国古典文学最重要的理论指导思想之一。对于中国抒情传统理论的争议,多半是由接受者由外而内的认知导致的,如果从这一理论产生、发展和演变的思想脉络去理解,会对这一理论有更加清晰的认识,许多争议也会迎刃而解。随着国内对海外汉学研究关注的增加,中国抒情传统理论也被国内学者在不同程度上接受,并应用到自己的研究中。本文将从中国抒情传统理论产生发展的脉络出发,勾勒出理论的结构框架,总结中国抒情传统理论之于古典文学在研究方法上的启发,以便对此研究方法有更为深入准确的理解。

一、比较文学视野下"中国抒情传统"概念的提出

中国抒情传统理论是由华裔汉学家高友工(Yu-kung Kao,1929-2016)创建,并由其学生应用到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去,在港、台及新加坡学者中得到响应和发展的一种海外汉学研究模式。抒情传统理论的发展,大致以高友工1978年秋返回母校台湾大学客座讲学为标志,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在此之前,抒情传统理论的研究分为理论研究和理论实践两部分,高友工是理论研究的开创者,其学生是抒情传统理论在古典文学研究中的主要实践者,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诗、词、戏曲等文体。高友工入台讲学后,一批学者接受并认同抒情传统理论,并将自己对这一理论的认识和理解,应用到各自的古典文学研究中。在港、台、新加坡学者的研究实践中,主要借鉴了抒情传统这一重要的理念,将之与自己的研究相结合,并做出了基于"抒情传统"这一理念的理论阐发,完

[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面上资助一等(项目编号:2020M680031);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特别资助(项目编号:2022T150336)。

[作者简介]李雪,南开大学文学院助理研究员,邮箱:lixue0213@163.com;高斌,南方科技大学人文社科学院荣誉学会会士,助理研究员。

成了对抒情传统研究的开拓与发展,这个阶段研究的范围扩展到古体抒情散文、古代小说、古典文学批评理论及现当代文学领域。在高友工进行系统的理论建构之前,中国抒情传统的相关理念首先在比较文学研究领域中被提出。

1971年,陈世骧(1912-1971)在美国亚洲研究学会比较文学讨论组所作的《论中国抒情传统》报告中首次提出中国抒情传统的概念[①]。作者从中西比较文学视角提出"中国抒情传统"这一概念,对古典中国文学以抒情为主要特征的艺术特点作了相对抽象的概括,借此与西方古典文学中戏剧和史诗所表现出来的叙述性相区别。作者对这一概念的提出,最大的特点就是立足于比较文学的语境。陈世骧在提出中国抒情传统这一概念不久后去世,没能对这一概念作更进一步的阐发,但从他1971年之前发表的一些作品中,能看出其对中国抒情传统的关怀[②]。他对抒情传统的认识,依旧停留在中西比较文学语境之下,是对中国古典文学审美本质的简单化概括。也正是中国抒情传统概念提出时的这种特点,导致日后部分学者对这一概念产生怀疑,进而影响了这一理论的传播。质疑者多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资深学者,他们从中国古典文学的实际状况出发,认为中国古典文学中并无此种一以贯之的抒情传统。

陈世骧在提出中国抒情传统这一概念时,所使用的"抒情"概念,译自"Lyric",源于西方文学中的抒情诗。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曾在1800年版的《抒情诗集》序中提到,抒情诗歌是内在强烈情感无意识地自然流露,并强调情感在诗歌中的重要性[③]。这种抒情观念显然与中国古典诗歌中的观念有很大区别,中国传统的诗学观念将诗歌最终的情感表达归结于"言志",而不是内在情感的充分表达。这种以"言志"为旨归的诗学观念显然区别于西方以"抒情诗"作为诗歌典型的诗学观念。从这一角度来看,陈世骧将"抒情传统"概念用来描述中国古典文学并不合适。但是从陈世骧所处的近现代历史文化语境中来看,中国抒情传统概念是在西方浪漫主义文学传统参照下,对中国文学本质的一种极其抽象的概括。其实陈世骧提出的中国抒情传统概念,与高友工进行的理论构建着眼点有着很大的区别。"抒情"概念的内涵也随着中国抒情传统理论的构建逐渐丰富,成为一个外延十分广泛的文艺批评概念。

二、中国抒情传统理论的构建

在陈世骧提出中国抒情传统这一概念前后,高友工和梅祖麟共同发表的一些文章中就体现出高友工对抒情传统研究的方法论探讨。两人合著的文章分别是:《杜甫〈秋兴〉:语言学批评尝试》(1968年)[④]、《王士禎七绝结句:清诗之通变》(1969年)[⑤];《唐诗中的句法、用字及意象》(1971年)[⑥];

①陈世骧:《论中国抒情传统》,《抒情之现代性:"抒情传统"论述与中国文学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45-51页。

②1971年之前陈世骧的主要作品有:"'*Chinese Literature*' *in Encyclopedia Americana*"(《美国百科全书·中国文学》1952年版)、"*The Culture Essence of Chinese Literature*"(《中国文学的文化本质》1953年版、《中国诗歌中之自然》1959年版)、"*Chinese Poetry and its Popular Sources*"(《中国诗与民俗之因缘》1961年版、《中西文学的相互影响》1971年版)。

③William Wordsworth and Samuel Coleridge, Michael Gamer and Dahlia Porter (eds.), *Lyrical Ballads: 1798 and 1800*, Peterborough, Canada: Broadview Press Ltd, 2008, pp. 181-184.

④Tsu-lin Mei and Yu-kung Kao, Tu Fu's "Autumn Meditation": An Exercise in Linguistic Criticism,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28, 1968, pp. 44-80.

⑤高友工:《美典:中国文学研究论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382-398页。

⑥Yu-kung Kao and Tsu-lin Mei, Syntax, Diction, and Imagery in T'ang Poetry,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31, 1971, pp. 49-136.

《唐诗中的意义、隐喻与用典》(1978年)[①]。这四篇文章都是运用语言学分析方法,对古典诗歌进行研究,侧重在语法、语义层面对诗歌解读。这样能从细致的解读中掌握诗歌的创作特点。虽然此后高友工对抒情传统理论的研究,并未像最初那样带有如此鲜明的语言学特色,但其理论构建就是建立在语言学分析法及创作论两个层面的,在其后学对抒情传统理论的实践中,这种文本分析法也成为他们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分析方法。之后高友工发表的《文学研究的美学问题(上、下)》[②],从美学视角构建抒情传统研究的理论范式,从作者角度分析作者创作作品的原因以及作者如何实现自身的抒情目标。这两篇文章标志着高友工将文学抒情传统的研究进一步引入美学研究领域。随后他发表的《中国抒情美学》[③]对抒情美学作了较为全面的阐述,在文中对抒情美学的阐释已由文学领域扩展至音乐、绘画等传统艺术领域,并对抒情美典的内涵作了较为详细的阐述。此后较为盛行的"抒情美典"一词就是由此文中"Lyric Aesthetics"翻译而来。但很多中译本将高友工的这篇文章译为《中国抒情美学》,实际上与高友工在以后的著作中提及的"抒情美典"一词含义近似。值得注意的是,高友工在其英文原文中并未直接使用"Chinese Lyric Tradition"(中国抒情传统)一词。此后高友工又在《中国文化史中的抒情传统》[④]对"抒情美典"[⑤]这一概念作了更为详细的论述,使这一概念成为抒情传统理论中一个重要的美学概念。在文中之所以使用"抒情传统"一词,是将抒情美典推广至整个中国文化史语境之中,涵盖了音乐、以抒情为导向的文学理论、律诗、书法及绘画等美典,皆可囊括于抒情美典的论述之中,构成整个古典艺术领域的抒情传统,"抒情传统"一词更倾向于在历史语境中对中国古典艺术美学特征的本质性概括性表述。

高友工不仅在理论上对抒情传统进行阐发,还在具体的文学研究中实践并完善抒情传统理论。他受余英时的影响曾在《试论中国艺术精神》提到中国艺术史上的四个突破时期:"他(余英时)所提到的四次突破,代表了中国文化在本体或形式上的重要转变。第一个突破是东周时期从春秋末季到战国中期,也即是公元前五世纪和公元前四世纪的时期。第二个突破是在汉魏之际,亦即公元二、三世纪的时期。第三个突破可以说是唐宋之际,五代与北宋特别是十及十一世纪正是其关键时期。第四个突破是明清之交替从万历到顺治的十七世纪反映了这个转变。"[⑥]高友工将余英时对中国文化史的划分,应用到艺术史领域。简要来说,这四个时期的突破可概括为:第一个突破是以音乐为中心的艺术美典的建立;第二个突破是以五言诗为代表的文人诗的出现,以及绘画、书法艺术美典的建立;第三个突破是以词为代表的抒情美典的确立,完成了由律诗向词体的转变;第四个突破是以戏曲为代表的新的美典的确立。受此影响,高友工及其后学将研究的着力点主要放在相关抒情诗体的转型时期。相关主要成果有:《古诗十九首与自我表现美学》[⑦]《词体之美

---

①Yu-kung Kao and Tsu-lin Mei, Meaning, Metaphor, and Allusion in T'ang Poetry,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38, No. 2, 1978, pp. 281–356.

②高友工:《美典:中国文学研究论集》,第19–89页。

③Yu-kung Kao, Chinese Lyric Aesthetics, In *Words and Images: Chinese Poetry,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Alfreda Murck and Wen C. Fong (eds.), New York: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47–90.

④高友工:《美典:中国文学研究论集》,第90–142页。

⑤作者在文中对"抒情美典"概念做了较为复杂的阐释。笔者根据自己的理解,为这一概念下一个简单的定义:抒情美典是基于抒情诗体的抒情传统而建立起来的,具有阶段性和层次性特征的美学范式,它以外在结构和内在原则为支撑,在抒情自我与抒情现时两个维度上展开讨论。

⑥高友工:《美典:中国文学研究论集》,第164页。

⑦Yu-kung Kao, The Nineteen Old Poems and the Aesthetics of Self-reflection, in *The Power of Culture: Studies in Chinese Cultural History*, Willard J. Peterson, Andrew H. Plaks and Ying-shih Yu (eds.),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80–102.

典》《小令在诗传统中的地位》《中国戏曲美典初论——兼谈昆剧》《中国之戏曲美典》,这些文章都以不同文体抒情美典为研究对象,探讨这一文体区别于其他文体的美学特征,着重分析各种抒情美典的抒情特征是如何形成的,以及这种美学范式对抒情的意义。

此后,高友工的很多学生都在其中国抒情传统的理论指导下,分别在不同的文体领域展开了对中国抒情传统的研究。诗词领域的代表著作主要有:孙康宜《从晚唐到北宋词体之演进》《六朝诗歌》《情与忠:陈子龙、柳如是诗词因缘》[①]和林顺夫《中国抒情传统的转变:姜夔和南宋词》[②]。诗文理论领域的代表性学者为蔡宗齐,代表作为:《汉魏晋五言诗的演变:四种诗歌模式与自我呈现》《语法与诗境——汉诗艺术之破析》[③]。戏曲领域主要有:容世诚《〈邯郸记〉批评研究》[④];何来林(Ho Lai Lin)《文化转变与历史剧中的中华观念:以清初的两部戏剧为例》[⑤]等。古典小说领域有:高友工《中国叙述传统中的抒情境界:〈红楼梦〉与〈儒林外史〉读法》[⑥]。

三、中国抒情传统理论的发展

受篇幅所限,本文主要以研究古典词为主的两位学者林顺夫和孙康宜的研究为分析对象,解读在中国抒情传统理论指导下,具体在文体研究实践中的应用。林顺夫《中国抒情传统的转变:姜夔与南宋词》从姜夔的词序入手,分析姜夔词对抒情传统转变产生的影响。作者着重探讨了词序在词作中的作用,以及词序与词作之间的互动关系,并分析了姜夔词作中的咏物词。作者对词作的分析主要借鉴语言学中的相关概念。词序的出现之于词体抒情的审美演变具有重要的意义,作者将姜夔词作为研究个案,目的在于通过分析姜夔词作区别于传统词作的新的特征,并探讨这种新变之于词体抒情的重要价值。作者还采用类似的词作分析方法研究吴文英词,其《南宋长调词的空间结构:阅读吴文英的〈莺啼序〉》[⑦]从空间结构的形成角度,对词史上最长词作的抒情特点加以分析,并兼及长调词的形成问题。此外,作者还有一篇文章从词论的角度谈及词体文体特征的演变问题,就是《词之文体特征的形成》[⑧],在这篇文章中,作者从词体观念之形成入手,回顾了历史上歌词审美特征的形成过程,并对与词体观念相关的理论作了阐述,来探求词体自身具有的审美特征。林顺夫为词体抒情传统研究奠定了基础,其研究成果可以给词作研究者带来如下启示:首先,以语言学的分析方法及创作论的视角对文本分析,探求作者主观抒情与文本表达之间的关系。其次,词人及词作的研究要纳入到词体美典审美演变的传统之中,这样才能突显研究对象区别于传统词作的价值所在。最后,词人词作风格就是借助词作的构思及语言的使用来传达的,文本的

---

①参见[美]孙康宜著,李奭学译:《词与文类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钟振振译:《抒情与描写:六朝诗歌概论》,中国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01年版;孙奭学译:《情与忠:陈子龙、柳如是诗词因缘》,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②参见[美]林顺夫著,张宏生译:《中国抒情传统的转变:姜夔与南宋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③参见[美]蔡宗齐著,陈婧译:《汉魏晋五言诗的演变:四种诗歌模式与自我呈现》,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语法与诗境——汉诗艺术之破析》,北京:中华书局,2021年版。

④Sai-shing Yung, A Critical Study of "Han-tan chi", Ph. D. Disserta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1992.

⑤Lai Lin Ho,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and the Chinese Idea of a Historical Plays: Two Early Ch'ing Plays, Ph. D. Disserta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1999.

⑥高友工:《中国美典与文学研究论集》,中国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4年版,第353-370页。

⑦ Shuen-fu Lin, Space-Logic in the Longer Song Lyrics of the Southern Sung: Reading Wu Wen-ying's "Ying-t'i-hsü", *Journal of Song-Yuan Studies*, No. 25, 1995, pp. 169-191.

⑧Shuen-fu Lin, The Formation of a Distinct Generic Identity for Tz'u, In *Voices of the Song Lyric in China*, Pauline Yu (e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 pp. 3-29.

主体性在抒情传统研究中是不容忽视的[①]。

孙康宜关于抒情传统研究的著作颇多，其《晚唐到北宋词体之演进》将词体的演变与代表性作家的词作相结合，分析词体的特点是如何体现在不同作家作品中的，从具体词作的分析中来揭示不同词人的创作是如何推动词体演进的。此书中译本为《词与文类研究》，也意在揭示书的主旨是研究词体作为抒情美典之一，有区别于其他文体的审美特征。作者在序言中提到："本书中对词体的研究基于两点：第一点，一种文体的演进是对一个时期新的美学及文化价值的反映；第二点，文体的最终价值存在于其动态演进之中。"[②]这两点其实也是词体抒情传统的主要研究方向，将词人词作的风格纳入到词体审美演变的脉络中去考察，可以很好地突显词人词作所具有的时代特色及审美价值。

孙康宜的另一本著作《情与忠：陈子龙、柳如是诗词因缘》将陈、柳两人之间的诗词交往联系在一起，研究诗词中情与忠的两大主题在当时的时代环境之下是如何有机统一在作品中的。作者注重探讨诗词的创作与前人风格的联系，将作品解读放到历史纵向与时代当下两个坐标中进行考察。此外，孙康宜也延续了抒情传统研究从语言问题及句构入手的方法，以及文本细读的批评方法，这些都值得后人加以借鉴。其中文本细读的分析方法，可以视为高友工早期借助语言学分析方法解读文本的一种延续和发展，在方法思路上具有一致性。其《抒情与描写：六朝诗歌概论》，通过对六朝代表性诗人诗作的研究，从抒情诗的抒情与描写两个方面探讨六朝诗歌对抒情传统的承袭与发展，其中还涉及到对抒情视野的探讨以及山水景物描写对诗歌抒情的影响等问题。此外，孙康宜的论文《〈乐府补题〉中的象征与隐喻》[③]对《乐府补题》中咏物词的分析，探讨古典词作中象征与隐喻二者是如何相互补充的，其中也涉及到古典诗词中的象征传统，以及读者阅读中的共感体验。

1978年秋，高友工返回其母校台湾大学客座讲学一年，此后1987年暑期及1993年等又多次返回台湾讲学和发表演讲，并在港台学术刊物上刊发与中国抒情传统相关的论文，使其中国抒情传统理论在港、台和新加坡地区引发一轮热潮，致使相当一大批学者加入到对中国抒情传统理论的探讨和研究中去。由于高友工关于抒情美典理论的建构，带有较强的哲学思辨性，很难在几次讲座或几篇文章中加以系统呈现，因此港、台和新加坡学者对抒情传统理论的接受，也因个人的理解和研究对象的不同，产生了学术理念上的差异。这一阶段的学者主要继承了高友工中国抒情传统的理念，并将抒情传统理论应用到自己研究领域之中，使中国抒情传统的研究得以深化和拓展。新加坡的萧驰在诗歌、小说及古典诗学理论方面涉足中国抒情传统研究，主要著作有：《中国诗歌美学》《中国抒情传统》《抒情传统与中国思想：王夫之诗学发微》[④]。这些著作都以不同的文体为切入点，运用创作论及语言学的相关理论及概念，围绕着文本及诗学理论是怎样抒写情感的这一中心，进行文本分析和解读，进一步扩大了抒情传统理论对古典文学研究的指导价值。台湾的一批代表学者如吕正惠、张淑香、蔡英俊等，则通过融合西方文艺理论和中国抒情传统理论，对中国古

①关于文本分析在词作研究中的重要性参见Shuen-fu Lin, The Importance of Context, *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 Reviews (CLEAR)*, Vol. 4, No. 2, 1982, pp. 303-314.

②"For these reasons, the genre study in this book is based on two assumptions: first, that a genre evolves in response to new aesthetic and cultural values of an age, and second, that its ultimate significance rests on its dynamic evolution". See Kang-I Sun Chang,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Tz'u from late T'ang to Northern Sung*, Preface, p. 1.

③Kang-I Sun Chang, Symbolic and Allegorical Meanings in the Yüeh-fu pu-t'i Poem Series,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46, No. 2, 1986, pp. 353-385.

④萧驰：《中国抒情传统》，中国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版；《中国诗歌美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抒情传统与中国思想：王夫之诗学发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

典文学的抒情特质进行理论化表述。以王德威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则进一步将抒情传统理论的研究引入现当代文学研究,使抒情传统的相关研究进一步发展深化。中国抒情传统理论在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影响,之所以远超其最初产生的古典文学领域,原因在于彼时国内学界关于现当代文学的研究多借鉴西方文艺理论,亟须带有中国文学特色的理论加以指导,中国抒情传统理论则明显与学界这种需求相契合,反观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则对这种理论的需求相对较弱。

抒情传统的这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主力就是港台地区及新加坡的学者,主要以台湾的学者为代表。这一批学者对抒情传统理论的接受,与孙、林等直接接受高友工指导不同,主要是从阅读相关著作及与高友工的交流中获得,对抒情传统理论的认识也因人而异,并在自我认识的基础上对抒情传统理论有自己的发展和阐释。抒情传统理论在台湾受到很多学者的响应,其中以蔡英俊、吕正惠和张淑香等人为代表。蔡英俊在高友工抒情美学的指导下,将抒情传统引向批评史领域。其《比兴、物色与情景交融》[①]将文学批评史上具有代表性的修辞观念放到抒情传统的脉络中去考察,作者在书中考察了情景交融观念的发展历程,扩展了抒情传统论述在批评理论方面的成就。其论述区别于林顺夫的地方在于,他将一种文学审美观念纳入到抒情传统的体系之中,而不仅仅是单一的理论。所以词学批评中词话所表现出的审美观念及词学思想,也应该得到重视,作为对词人作品考察的一个重要补充。吕正惠关于抒情传统研究的代表作是《抒情传统与政治现实》,其在序言中的一段话表达了其所进行研究的立足点:“总结以上所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之所以终于从60年代‘西化论’和‘西方理论至上论’走出来,主要源于我对现实政治的关切,因此反过来思考我一向喜爱的中国抒情诗。因为有一种反弹情绪,我反而能客观地加以审视。”[②]作者认知的转变,源于对现实政治的关注,作者将这种理念运用到古典文学的研究之中,十分重视社会关系与政治变动对文学创作的影响。但这本书中直接对抒情传统进行讨论的文章主要有两篇:《物色论与缘情说——中国抒情美学在六朝的开展》和《中国文学形式与抒情传统》。前一篇作者以六朝的“物色论”和“缘情说”为研究对象,探寻六朝抒情美学观的特质,以此说明此美学观成为后世抒情美典的一个导源。在具体研究方法上与蔡英俊以情、景为主线的论述类似,但吕正惠的论述仅限于六朝。第二篇文章则是作者对中国文学的概述性文章,从中西比较文学视野切入,简要论述了多种文体形式与抒情的关系。张淑香的代表作是《抒情传统的省思与探索》[③],其中一篇为《抒情传统的本体意识——从理论的“演出”解读〈兰亭集序〉》,可视为其对抒情传统理论的自我解读与认识。作者以《兰亭集序》作为文本分析的对象,从中提炼出集体共感意识,认为这种由对于生命存在的整体意识所感发而来的抒情,才是抒情传统的重要起点,与高友工、吕正惠视《古诗十九首》为抒情传统之起点的论述颇为相似。

之所以将台湾几位学者放在一起论述,主要是笔者认为台湾学者对抒情传统的承续,主要延续了抒情传统理论最本质的一点,即中国古典文学的抒情导向[④],在此基础上,文学作品的语言表达、结构构思、艺术手法等都围绕抒情这一导向展开。如蔡英俊关于古典文学“文学性”的一段论述:“譬如说向皇帝上书表示意见的‘章、表、奏、议’,尽管有其独特的语文表现模式,同时也的确具有‘表情达意’的功用,我们是否可以就此认定它们的‘文学性’?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尤其是我们要从社会文化的立场来考察这些现象存在的因缘时,更是如此。虽然如此,我们却尽可摆落一切外在功能的解释,纯粹就文学作品本身所具的自律性(autonomy or identity),也就是文学

①参见蔡英俊:《比兴、物色与情景交融》,中国台北:大安出版社,1990年版。

②吕正惠:《抒情传统与政治现实》,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6页。

③张淑香:《抒情传统的省思与探索》,中国台北:大安出版社,1992年版。

④笔者认为学者们所认为的中国古典文学所具有的“抒情传统”,是以古典文学作品为客观存在对象,以今人视角出发的解读,根源仍源于中国抒情传统理论最初提出的比较文学视野,而不是从中国古典文学本身所展现出来的审美观念出发,所提出的“抒情传统”。前者是一种由外而内的认识结果,后者则是一种由内而外的理论总结。

作为一种语言艺术的必要理则——以语言为本质，以艺术为效用——作为判断的基准。”[①]作者所提到的这种文学性，实则就是文学的抒情性。其实三人对抒情传统的承续中，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学者们基于这点共识，从广义的抒情传统理论出发，将这一理念应用到自己的研究中，并在不同方面丰富发展了抒情传统理论。其次就是文本分析中对结构语言学的应用，但这种具体的文本分析并不多见，三人所涉及的问题依旧是理论层面相关问题的探讨。

除此之外，需要着重一提的还有新加坡萧驰的论文集《中国抒情传统》，其研究领域主要涉及文学理论及小说。笔者认为作者探讨的主要方面是抒情传统背后所具有的深层文化渊源，作者尤其赞同张淑香提出的“集体共感意识”这一概念，认为这种同情同感的生命意识，才是中国抒情诗的本体，作者所进行的研究就是通过个案分析探讨个案背后的抒情本体。在笔者看来，作者与抒情传统理论的渊源主要体现在这种观念上的承续，而在具体的文本分析及批评实践中，并没有延续高友工的文学创作论及语言学批评方式和方法。将抒情传统的研究引入中国现代文学的学者是王德威[②]，其在对现代文学的研究中强调中国抒情传统对文学的影响，使学界在讨论文学现代性的同时，不能忽略中国文学本身所具有的抒情传统的影响。其实，笔者认为抒情传统研究第二个阶段的学者，包括将抒情传统引入现当代文学研究之中的王德威，所承接的仍然只是抒情传统的理念，而并非高友工最初倡导的抒情传统理论及其实践，不过这些研究成果仍可视为抒情传统理论在中国文学研究中的理论发展。

四、结语

中国抒情传统理论是学界研究中国文学一种较为成熟和系统的理论，其理论建构已经成为一个体系，并且对中国文学研究具有理论指导价值。可以说是区别于传统古典文学研究方法之外的新的研究范式，对中国文学研究尤其是古典文学研究具有极大的启发。不可否认的是，中国抒情传统理论产生于海外汉学研究的发展脉络之中，从中可以看到当时汉学研究语言学转向、理论先行等特点，带有学术研究较为鲜明的时代特色。传统古典文学研究的方法依旧传承知人论世的思维，加之以实证方法，而抒情传统理论的出现，则将古典文学的研究回归到文本的主体性，将文本的解读纳入到抒情传统的体系之中。而对于中国文学具有“抒情传统”这一概念的提出，以及在此基础上高友工所构建的抒情美典理论体系，则为看似纷繁复杂的中国古典文学，建构了一个主干传统。海外汉学家在研究中国文学方面，区别于国内学者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向非中文世界介绍中国文学，而这种建立在比较文学视角上的理论或者研究方法，无疑对于海外汉学家来说是最行之有效的。中国抒情传统理论在实践中，还引入了文本细读的批评方法与文学研究的语言学取向，都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值得现在古典文学研究者的学习和借鉴。随着越来越多的学者，在中国文学抒情传统理念上达成共识，也引导了抒情传统研究与思想史、社会文化史等研究的结合，使抒情传统理论的外延不断延伸，为中国文学的研究提供了更多新的视角。总之，中国抒情传统理论，虽然有其理论的局限性，但作为中国文学研究一种新的成系统的理论研究方法，在很多方面都值得古典文学研究学者进行学习和借鉴，将其中的方法和启发应用于相应的研究领域，相信会有更多新的发现与认识。

[责任编辑：李　炜]

①蔡英俊：《中国文学的情感世界》，合肥：黄山书社，2012年版，第8页。

②王德威的代表作主要有：《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2003年版）、《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在北大的八堂课》（2010年版）、《现代抒情传统四论》（2011年版）等。